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关键词:中唐;长安;江南;文化互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2-0014-06

初盛唐时期的大一统,给江南经济、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与动力,南方经济有逐渐赶上北方的趋势,国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江南,“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1]。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天宝以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2]。遥远的江南似乎与长安的联系更加密切。

一、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

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由于江南道地域过于广袤,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时,又把它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

黔中道3个部分。唐代中后期,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部置湖南道,东部仍称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此时它已分属宣歙、浙东、浙西3个观察使管辖。其中,宣歙(今皖南)相对于两浙处于边缘,张九龄曾有“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之句可以为证。而在浙东(今浙东、浙南)、浙西(今太湖流域及浙北)的两浙之地,唐人又很敏感于吴和越的区别,在当时人心目中,吴地(今太湖流域)才是江南的典型。唐代以降,虽然江南的边缘时伸时缩,例如有时人们把地处江北的扬州也视作江南的一部分,但地道的江南一直是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

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的经济命脉是以江南为核心的江淮大地。安史之乱重创了以长安为核心的中原经济文化核心区,《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载:“函陕凋残,东周尤甚。”陕西、河南一带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旧唐书·郭子仪传》

收稿日期:2014-01-0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H019)

作者简介:梁中效(1961-),男,陕西武功人,教授。

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旧唐书·回纥传》曰:“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杜甫有《无家别》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长安城是叛军搜刮财富、破坏文化、残害人才的重点,《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叛军在长安城内掠夺财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叛军也在长安城内破坏文化:“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朝廷利用江南财富平定叛乱:“方今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3]“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4]《忠义传赞》载唐玄宗在蜀、唐肃宗在灵武之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亡壅”^[3],也就是沿汉水将江南财富转运到汉中,再由汉中陆运至关中。“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瑁陆运至扶风以助军。”^[3]唐肃宗用江南之财壮西北之军,平定了安史之乱。“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租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3]安史之乱后,长安的经济地位下降,江南的经济地位上升。朝廷的日常运转仰仗江南:“军国费用,取资江淮”^[2](《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册尊号赦》)。随着北方藩镇割据的猖狂和经济的萧条,长安对江南的依赖与日俱增:“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5](《送陆歙州诗序》)。“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6](《故太子右庶子集贤院学士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并序》)。江南财富是中晚唐长安的生存粮仓:“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7]《旧唐书·刘晏传》载:唐德宗在兵变出奔汉中后,江南与朝廷的联系再次取道汉水:“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复绝。”^[3]兴元元年(784)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缁帛来至。”韩滉又运江淮米百艘支援关中李晟大军:“时

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滉至,减五之四。”^[3]这也证明以江南为主的南国对唐王朝的生存是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不臣之藩镇驛将常袭扰江南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德宗贞元二年(786)三月,李希烈寇襄州、郑州:“关中仓廩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见,江南漕粮是长安的生命线,得之则生,失之则危,恰如胡三省所言:“唐都关中,仰给东南之饘。德宗于兵荒之余,其窘乏尤不可言。”^[3]在东南经济区中:“浙西赋入尤剧”^[4]《旧唐书·王纬传》。载:浙东、浙西为江南的核心地区,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命运。唐末,朝廷失去了对江南的控制,覆亡的命运随之而至。“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因此,王夫之指出,安史之乱后,朝廷内忧外患:“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之为根本也。”^[8]陈寅恪更是明确地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所以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9]

二、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 长安的避难港湾

安史之乱期间,两京残破。《旧唐书·郭子仪传》:“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在此背景下,美丽安定的江南成为长安文化精英和“衣冠士庶”南迁的宁静港湾。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杜甫在《江南逢李龟年》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旧唐书·权德舆传》载:“两京蹂街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于江东。”权德舆在《与睦州杜给事书》中说:“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力行修词,人人自励。”^[2]安史之乱期间,“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2]“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2](《加恩处分流贬官员诏》)。郎士元《盖少府

新徐江南尉问风俗》说：“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10]韩愈《考功员外郎卢君墓志铭》载：“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5]文人士子和歌舞艺人南迁之后，多集中在江南的金陵（今南京市）、杭州、苏州、会稽（今绍兴市）等经济文化都会之中。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指出：“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炫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2]

苏州长期以来是太湖流域的区域中心，是江南东道的首府，被誉为“甲郡标天下”^[10]（《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北方南迁士人多集中于此。安史之乱时由北方迁到苏州的梁肃说，苏州治所吴县“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2]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时苏州人口63余万，依梁肃之言，包括士人在内的外来人口至少有20万。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也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多士奔吴为人海。”^[10]二者相互印证，说明苏州是长安等北人南迁的中心之一。李唐皇族释齐安，其祖先就是在安史之乱后由长安避地苏州海盐。“释齐安，俗姓李，实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门郡焉，深避世荣，终秘氏族。”^[11]李纾，天宝末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德元年避地苏州，后与包佶为“文章风韵主盟于世”，并称“包李”^[12]。

金陵因其龙盘虎踞的战略地位，也成为北方士大夫寄居的中心之一。《新唐书·韩滉传》记载，唐德宗建中年间，受关中军阀威逼，朝中有迁都金陵的建议，韩滉于金陵筑石头五城，楼雉相望，“置第数十于石头城，穿井皆百尺”。贞元二年进士及第的李陵，有“有别业在江宁”，与其父母定居于此^[13]。唐末，长安人刘著迁到金陵。韩洄：“天宝末，盗陷西京，兄侄七人遭罹不淑茹痛，违难寓于江南，布衣蔬食，不听声乐者，积六七年”^[2]（《太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颖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说明安史之乱后长安人口南迁的规模颇大，其中文人士大夫占有很大比重。

杭州物华天宝，为东南名郡，也是北方士大夫的移居地之一。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说：“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方隅有事以来，承制权假以相国元公，旬朔之间，生人受赐，由是望甲余州，名士、良将递临此部”^[2]。安史之乱后，长

安等地的“名士良将”多移居杭州，使这里的“兆人户口日益增”，成为南国名郡。

越州（今浙江绍兴）位于钱塘江以南，是浙东平原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北方士大夫的主要迁居地之一。安史之乱后，士大夫多南奔越州，“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2]（穆员《鲍防碑》）。开元年间著名道士吴筠，被唐玄宗召至京师长安为翰林供奉，“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常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越中。”吴筠是长安道教文化与江南道教文化传播的纽带。唐朝宗室李聿，玄宗朝官至尚书郎，后来在越州参加鲍防浙东诗会，可能是为了避乱由长安到越州^[2]。唐宗室李洧孙在唐末避居上虞、嵊、会稽三县交界山区^[14]。《李先生铭》载：包佶在天宝六年进士及第，后避乱至越州，与严维过从甚密，皇甫冉《宿严维宅送包七》曰：“江湖同避地，分手自依依。尽室今为客，经秋空念归。”^[10]包七即包佶，时严维任越州诸暨县尉。润州（今江苏丹阳）、湖州（今江苏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池州（今安徽贵池）、衢州（今浙江衢州）等江南名城名地，也都是长安及北方文人士子避难的佳地大郡和宝地名城，这里富足而宁静、美丽而崇文、淳朴而好客，自然而然地成为长安等北方士人南迁的乐土。“这些地区位于江南北部、中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当然也是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故而集中了绝大多数的避难士人。”^[15]号称江南“四夔”的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就旅居在金陵和宣州一带，《旧唐书·崔造传》曰：“（崔）少涉学，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金陵）。”南迁士人们将盛唐长安文化的精华带到了富饶美丽的江南，带动了长安与江南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加快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

三、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

“安史之乱”之前，士人对江南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很到位的认识。北方大士族的文人代表王维有许多来自湖州、嘉兴的江南朋友，如丘为、储光羲。但他的诗里很少有赞美江南风物的句子，他似乎也从未光临过江南。在他眼里，北方才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江南不过偏壤一块。所以，“漠漠水田飞白

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名句至今令后人齿颊留香,而“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的写江南的句子已沉睡在他的诗集里。与士族子弟王维不同,李白、杜甫还是来过江南的,江南留给了他们美好的印象。除了赞美江南水乡的美景,他们都记住了江南女人白皙的肤色。李白《越女词五首》曰:“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杜甫《壮游》曰:“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江南景美、人美,但在其时是不能留住诗人们“西北望长安”的心的。就像汪伦的踏歌声里所含的深情纵然超过了桃花潭的深度,李白还是乘舟走了。

安史之乱后,“多士奔吴为人海,天下学士亦奔波”,出现了长安文化精英南迁的壮美气象,“长安路绝鸟飞通,万里孤云西复东”。明媚又宁静的江南,文化繁荣,英才辈出,诗坛的繁荣影响了长安。如大历时期的刘长卿、戴叔伦、严维、钱起、权德舆、顾况、皎然等,诗才纵横;元和时期的张籍、李绅、孟郊、张志和等,个性鲜明;晚唐时期的陆龟蒙、贯休、罗隐、杜荀鹤等,开拓创新。因而辛文房称“当时东南多才子”,使东南成为与长安互动密切的一个文学中心和文化中心。唐代南北方的文人墨客,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精英,乃至达官显贵开始全方位地欣赏、学习、传承江南文化。他们忆江南、梦江南,江南不再是遥远的他乡,而是文化和精神的乐土。皇甫松《梦江南》曰:“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这首词得到古今一致好评。陈廷焯《白雨斋词评》曰:“梦境化境,词虽盛于宋,实唐人开其先路。”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情味深长,在乐天(白居易)、梦得(刘禹锡)上也。”对江南爱之切,才产生了词之美。

第一,长安与江南的文化差异颇大,相互吸引而共同提高。《隋书·文学传》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描写了江南与北方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南北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的差异,导致南北文学与文化的差异。隋和初盛唐时期的北方关陇贵族有着浓厚的南朝化倾向,地域空间上大运河的开凿和文字艺术上官体诗的盛行都是典型例证。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太宗转溯南风,南方文彩风流,终于战

胜北人之朴厚。”^[16]科举制的发展和进士科以诗赋为主的考试内容,为江南文人挺进长安提供了制度保障。“长江之南,世有词人。”才华横溢的江南文人,在唐代前期络绎北上,寻找政治出路,为质朴的长安带来许多新鲜色彩,装点了帝国首都的文坛,同时使科举竞技更加激烈^[17]。中唐以后,江南才子纵横驰骋在长安文坛之上,使长安文坛百花争艳、万紫千红。《旧唐书·贺知章传》曰:“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上京。”江南文人为唐代诗坛增光添彩。实际上,以诗歌创作为长安文坛注入活力的并不止以上诸位,《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曰:“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徐杭尉丁仙芝、缙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瑒、长洲尉谈戴、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这些活跃的江南诗人,将长安诗坛装点得五光十色。

第二,中唐之后江南经济与文化并秀,成为长安的文化花园。“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让黄河流域的士子终于有机会认识到江南景美、人美之外的价值。江淮地区就在那时成了唐王朝的经济支柱,成了当时北方士族的避难港湾。灵秀的江南终于在它的风水里孕育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因为战乱,都把童年、少年甚至部分青年时光留在了江南。刘禹锡回忆童年生活时,赋诗《送裴处士应制举》说:“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斗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一笑且开颜。”但他们还是回了北方,那时的江南还没有足够的魅力让他们留下心、留下根。在他们及同时代的文人笔下,梅雨和脚气病是两样让他们望而生畏的江南“特产”。当然,水土不服只不过是借口,原因还是他们念念不忘“西北望长安”。安史之乱后,以长安为核心的北方士大夫南迁,将盛唐长安文化的精华带到了江南,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曰:“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10]江南以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为傲。皎然在《诗式》卷四中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

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馀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元朝人盛如梓在《庶斋老学丛谈》中开列了一个更详细的江南诗人名单：“唐诗人江南为多，今列于后：陶翰、许浑、储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颂、沈如筠、殷遥，润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伦，金坛人；陆龟蒙、于公异、丘为、丘丹、顾况、非熊父子、沈传师、诚之父子，苏州人；三罗虬、邕、隐、章孝标、章碣，杭州人；孟郊、钱起、沈亚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频、方干，睦州人；贺德仁、吴融、秦系、严维，越人；张志和，婺人；吴武陵、王贞白，信州人；王昌龄、刘昫虚、陈羽、项斯，江东人；郑谷、王毂，宜春人；张乔、杜荀鹤，池州人；吉中孚，饶州人；刘太真、顾蒙、汪遵，宣州人；任涛、来鹏，豫章人；李群玉，澧人；李涛、胡曾，长沙人。皆有诗名。”可谓群星灿灿，熠熠生辉。

第三，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文化基地与人才摇篮。中晚唐时期，长安文坛的旗手韩愈、白居易和文坛健将权德舆、刘禹锡等，相继旅居江南或出生在江南，促进了长安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使江南成为长安的文化基地。青春勃发的韩愈曾在江南渡过了五六年安静的人生时光。大约是从建中二年（781）到贞元二年（786），即韩愈13~18岁的青年时期，“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韩愈兄长韩会的产业在宣城，为韩愈系统地学、为文创造了条件，他在此接触到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先驱人物。《旧唐书·韩愈传》曰：“大历、贞元之间，文学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研，欲自振一代。”韩愈古文运动的基础奠基于江南。权德舆祖籍天水略阳，但生于江南润州，其父权皋博学多才、卓尔不群，与江南才子名宦李华、颜真卿交往甚深，权德舆在江南渡过了成长为学的青少年时期，为日后的仕宦与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刘禹锡占籍洛阳，但生长于江南的嘉兴，早岁即结交、师事江南著名文士，与权德舆、皎然、灵澈等人都有密切的交往，为其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条件。白居易一生与江南有着十分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少年旅居吴越，得到了江南美景与人文精神的熏陶；青年宣州乡试，为宣歙池观察使崔衍贡举，实现人生大跨越；晚年刺守杭州、苏州，诗歌创作进入又一兴盛期^[15]。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与辉煌成就，有着浓墨重彩的江南文化烙印。中晚唐时期，江南人才主宰长安文坛。《郡斋读书志》卷一八评权德舆说：“其文雅正赡缛，当时公卿功德卓异者，皆所铭记，虽动止无外饰，其

蕴藉风流，自然可慕。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当中原陷入战火中时，韩愈、白居易、权德舆、刘禹锡等人，是江南地区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他们后来科举及第，仕宦长安，成为当时文宗或驛将，使江南成为长安文化的人才摇篮。

第四，“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江南的诗酒文会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嘉年华会。安史之乱后江南成为两京之外的文化中心，南北方文人、士大夫风云际会，徜徉在优美的江南山水之间，频繁而广泛地开展诗酒文会。“壶觞须就陶彭泽，时俗犹传晋永和”^[10]；“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10]；“骋望傲千古，当歌遗四愁”；“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这种模仿兰亭宴集的风流雅致，以文化交流与诗歌创作为内容，推动了江南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大历年间规模盛大的浙东湖州诗会，是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与皎然等文友组织发起的，是长安与江南文士的嘉年华会，前后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影响甚广。诗会盟主颜真卿，系长安人，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及第；安史乱起，坚守平原，誓死抗敌，朝野敬仰，居功至伟；他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书法精绝，敦厚颜体，筋肉丰满，盛唐代表，当之无愧；任湖州刺史后，一方面组织文士编修类书《韵海镜源》，一方面举办诗酒文会，成为沟通长安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灵魂人物，加快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北方南来文士是诗会的重要力量，是所谓“北客来江外，秋山到越中”，“故交多此见，清兴复能同”，词人、北客、故交都来到了江南，为诗酒文会带来厚重的北方文化；江南本土文人则是诗会另外一大主力，为诗酒文会注入了清新的江南文化，越州严维、湖州皎然是中唐江南本土诗人的领袖，是诗会的东道主，是沟通南北文化、南北诗坛的桥梁与纽带^[15]。诗酒文会是南北文化荟萃的嘉年华会。对祖居地的留恋敌不过对战乱的恐惧，就像对富庶安定生活的热爱远不及对显赫名位的追求，唐代文人在“长安”与江南之间，终于因为时间的作用，而在公元9世纪末有了了断。这个代言人就是韦应物的四世孙韦庄。他的《菩萨蛮》写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位“长安”少年在“春水碧于水，画船听雨眠”的江南，虽然也像当年的李白、杜甫那样魅惑于江南女人的“白”，却早没了他们的倨傲，堆满心头的是终老斯土的祈愿。韦庄若是王维的后人，唐代文人的这个关于江南的情结会演绎得更完美些。生于“南国”的红豆，不单是“此

物最相思”,更荷载着一个民族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美丽愿望。

四、结 语

总之,中晚唐时期长安与江南的经济、文化互动更加密切,大唐长安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全赖江南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参考文献:

[1] 李肇. 唐国史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董诰. 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其昶,校.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6.

[6] 权德舆. 权载之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 刘煦. 旧唐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9]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 赞宁. 宋高僧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 刘禹锡. 刘禹锡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黄潜. 文献集[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5] 景遐东. 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7] 李浩.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Chang'an and Gangnam area after mid-Tang dynasty

LIANG Zhong-xi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due to the faster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economy and culture than the north, Gangnam area gradually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Chang'an. In history, "Gangnam" was a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flexible geographical concept. Comparatively precise concept of Gangnam finally formed until Tang dynast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term of "Gangnam" had broad and narrow sense. From the broad sense it was Jiangnan Dao in ten Daos of golden years, while from the narrow sense it was "eastern Jiangnan Dao" in mid-Tang dynasty, with nowadays south of Jiangsu and north of Zhejiang as the center. Affluent Gangnam was the survival granary of Chang'a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so that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military cost came from Jianghuai area. The saying that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took refuge in Gangnam emerged" because beautiful Gangnam was the refuge harbor of Chang'an. Developed culture of Gangnam was the cradle of talents, so that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there were lots of wits in the southeast".

Key words: mid-Tang dynasty; Chang'an; Gangnam; cultural interaction; cultural exchange